



平台搭建、资源发布、业内学习与大众参与相结合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展在线培训促人才培养

□范雪琳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人才培养一直是古籍保护重点工作之一。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类线下培训的时间、人数、场地等受到严格限制。既往古籍保护线下培训按要求缩减班次和规模，无法满足全国业内人员的培训需求。为满足古籍保护业务发展需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积极拓展在线培训，多方调研培训平台与技术，借鉴其他在线培训经验，采取课程录制、平台搭建、资源发布、评分考核相结合的在线培训模式。同时，将培训课程免费向公众推送，实现业内学习与大众参与相结合的双重效果，收到良好社会反响。

2021年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针对全国古籍收藏单位建设与管理、全国古籍数字资源建设与平台开发，在线举办“古籍库房建设与管理研修班”和“古籍数字化建设研修班”。两期培训分别邀请到业界4位古籍库房建设专家和5位古籍数字化建设专家讲授10门课程，合计授课时长超过1000分钟。

古籍库房的建设与管理直接关系到古籍本身的保存与安全，如何建立符合古籍存储环境标准的库房，并在保护古籍的同时使古籍得到有效利用，是各收藏单位一直面临的问题。随着国家图书馆（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联合全国10余家单位共同起草的《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GB/T 30227—2013）正式发布，古籍保存环境以及特藏书库的建设有了标准依据，科学技术的提升也使得现代化的古籍库房建设理念正在逐渐形成。在“古籍库房建设与管理研修班”课程中，业界专家解读古籍保存环境的要求与标准、阐述受损古籍的应急处理措施，分享古籍库房相关工作管理与维护的实践经验，介绍如何在妥善保管特藏文献的同时提供读者服务等。

古籍数字化作为保护与传承珍贵古籍的重要手段，是数字文化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数字图书馆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籍数字化建设研修班”课程中，业界专家分析古籍数字化工作现状及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对策，分享古籍数字化资源服务平台建设经验，讲解古籍数字化建设的思路方法和对策措施，阐释如何长期保存、保护数字资源，探讨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环境下的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建设等。

两期培训班的课程设置切合实践应用，既回答了实际工作中普遍遇到的基本问题，也传达了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理念和新方法。相关课程通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全国上千家古籍收藏单位、

超5000人次在职人员参加了培训。部分海外古籍保护从业者也报名进行了学习。在满足业内人员学习的同时，两期课程也面向公众开放，在业内和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好评如潮。两期课程实际点击量突破10万次，其中“古籍库房建设与管理研修班”总点击量达到4万余次，“古籍数字化建设研修班”最高点击量达到6万余次，单次课程最高点击量达到1.9万次。学员们纷纷在公众号以及课程下留言或撰写学习心得，对培训班在古籍保护实际工作中的指导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对授课专家们深入浅出的讲解表示感谢，同时把自己学习中的收获向大家分享。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白秀玲表示，感谢老师们的辛勤授课，作为偏远地区的基层文博单位，能够聆听领域顶尖专家培训、了解业界前沿知识动态，实属不易，在此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致以热忱的谢意，并恳切希望能够继续开展一系列培训课程。国图书店书目数据中心工作人、高级经济师王沁写道，2021年全国汉文古籍普查工作基本完成，古籍保护工作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以预见，古籍数字化建设会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挑战更是机遇，能为这一事业中贡献绵薄之力，倍感荣幸。

在线开班的同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积极支持各地培训工作，应相关单位需求将已有课程视频远程推送培训现场，让培训资源更好地发挥作用。目前，在线培训已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和一大趋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进一步完善古籍保护人才在线培养机制，与社会各界携手，继续为业界和公众提供更多学习机会，立足长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多年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持续推进“培训基地、传习所、高等院校”相结合的“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加大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力度，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推动古籍保护学科体系建设。其中，从业人员在岗培训是推进岗位成才、培养古籍保护专门人才的重要方式。为解决古籍保护人才短缺的问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根据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实际需求，针对不同业务、不同水平的古籍保护工作人员，开设了种类丰富、内容充实的业内人员培训班。2007年至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举办古籍普查、修复、编目、数字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等各类培训班累计227期，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各类培训班320期，合计培训学员总人次超过2万人次，涵盖全国近2000家古籍收藏单位。

南开大学传习所完成首个修复项目

本报讯（记者张维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南开大学传习所自2020年9月挂牌成立以来，于近日完成首个修复项目《林颂河手札》，并将第二个修复项目——馆藏拓片的修复纳入工作计划。

《林颂河手札》的整理、修复项目由传习所导师万群带领3位学员历时一年余完成。林颂河192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再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归国后曾任清华大学兼职讲师、社会调查所研究员、中国实业银行经理。林颂河手札内容多是林颂河在南开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的校园生活，以及之后在福建中国实业银行工作时的日常。不仅对校园生活有多方位的记录，其中一些内容还涉及当时生活用品的价格，反映了民国时期部分家庭的生活水平。随信札捐赠的还有其游学地方的风景照和与亲朋们的人物照10余张。该批手札为林颂河后人边晓春先生捐赠，于2020年11月经南开大学原校长龚克教授引入入藏南开大学图书馆。手札共计446通、1000余页。

林颂河手札包含明信片、信封、信笺、名片等，是多门类载体在一宗文献上的呈现，修复过程涉及修、衬、挖、镶等多种技艺，因此被选为南开大学传



习所首个修复项目。万群导师表示，三个学员的修复水平参差不齐，用手札作为修复对象，修补的难度相对小些，有利于集中精力学习技艺，为未来修古籍打好基础。在实操教学之前，万群导师与学员一起设计修复档案、选择衬纸、设计衬纸规格，从保护和美观多角度考虑未来成品的尺寸。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她先复印了几种手札，自己试做，学员观摩掌握了技术之后才分配手札给各位学员，有序规范地开展修复工作。

手札整理、修复的难点之一是每件的材质、规格都不相同，还有部分信件有正反面书写的情况，同时有大量的折痕。万群导师提议用挖衬的办法整理这

批手札。这样可以借助衬纸的同一厚度与尺寸来补齐书信因材质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样貌，如对明信片采取单侧固定的挖衬方法，将明信片一侧固定在衬纸上，使其可以翻页，方便查阅背面信息。难点之二是钢笔字、毛笔字、信箋上的栏线等不同墨迹的稳定性不同。修复之初，传习所修复团队首先对边角位置的字迹进行洒水测试，发现只有笺纸的红色栏线会出现晕染现象，万群导师教学学员在信纸上加几张宣纸，用装裱专用熨斗隔着宣纸对信纸进行低温熨烫，使其平整，成功解决了晕染问题。除图书馆员工外，传习所还会选择相关院系学兼优的学生来体验、学习。

本报讯（记者刘晓立 通讯员李辉）

3月11日，由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甘肃省图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三期甘肃省古籍修复技术培训及理论研讨会”在甘肃省图书馆正式开课，当天，还举办了培训成果展。

在结业典礼上，甘肃省图书馆馆长肖学智与广大学员交流时表示，“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国家的战略计划，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古籍保护水平，拓展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甘肃省图书馆将发挥省馆龙头作用，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水平，为甘肃省培养专业、年轻、跨学科的古籍保护人才队伍。

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甘肃传习所导师师有宽代表授课教师发言，他高度评价了本期学员在培训期间表现出的业务素养和敬业精神，对全班同学合力修复的破损古籍以及书画装裱作业表示肯定，并勉励大家不忘初心，对手中的古籍心怀敬畏，技术追求精益求精，锻炼成为修复高手，把老一辈的事业接续发扬下去。

学员代表殷世鹏表示，通过此次培训，他们系统学习了古籍知识、修复技能以及书画装裱技术，为以后开展古籍保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次培训班的举办，对加强甘肃省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修复人员技能素质和专业水平，促进甘肃省古籍保护工作，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等将产生积极作用。

『第三期甘肃省古籍修复技术培训及理论研讨会』举办

古籍保护

“她力量”



吴寒，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文学博士。2017年进入国家图书馆，从事古地图整理与研究工作，对中国古代文学及文献、古典图及经典图像等颇有研究心得。多年来，在《文艺研究》《文献》《文化杂志》等期刊杂志发表文章数十篇，担任《地图》杂志“阅读地球”专栏常驻撰稿人，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定东陵卷》，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诗经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

一个“90后”的舆图时光

□吴寒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舆图组

2017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入职国家图书馆，2018年开始在古籍馆舆图组从事古地图整理与研究工作。得益于古籍馆良好的学术环境与科研氛围，几年工作下来，我的学术视野、研究能力得到了很大锻炼，取得了长足进步。

上学时，学院开设的历史地理学是最感兴趣的课程之一，老师向我们展示的几幅古地图使我印象深刻，学院门口挂着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也总是吸引我驻足观看。当时的我没有想到，自己后来的工作竟然会整天与舆图打交道。我的研究重心原本聚焦于古代文学及文献，博士阶段主要研究《诗经》及其现代转型，对于图像领域虽有关联，但涉猎不深。开始仔细钻研古地图这门深奥而又有趣的学问，是进入古籍馆之后的机缘巧合。

翻阅古籍可知，“舆图”得名的说法众多，而传播相对较广的讲法认为，“舆，地道也”，或取《周易》“坤为舆”之义，都指向大地以及其中所含的事理。诚然，从人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图像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摹绘方式反映了人的思维方式，那么地图作为一种特殊的图像，则反映了古人如何刻画地理、想象世界，以及如何看待人与大地的关系。换句话说，古舆图不只是地理经验的忠实记忆，也是古人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这种记忆、写照击穿时空，让我们与前人心灵交映。

这份感悟，是我在舆图组深

入接触古地图后获得的，伴随着不断深入的研究学习，感受愈发强烈。舆图是一类非常特殊的古籍文献，由于种种原因，地图的保存和流传比书籍更加困难，因此得以传世的古代地图极为难得。国家图书馆是国内古地图收藏的代表单位之一。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在海内外均首屈一指。入国图如入宝山，跟随着工作任务与自己的研究兴趣，我先后集中关注了澳门古地图、北京城图、山岳图、样式雷定东陵图、北运河图等。这些地图性质不同，差异不小，每一次研究工作都像一次新奇的探险，带来新的知识和启发。

比如在对馆藏澳门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中，我比对了中西古地图，发现在对澳门的定位方式、图像视觉中心的选取、提示信息的侧重等方面，双方都表现出了迥异的取向，折射出彼时中西不同的海洋意识及战略意识。而在对馆藏山川名胜舆图的研究中，我关注到地图中山岳图像的独特表现方式，对比地图中的绿水青山与绘画中的绿水青山，既可以看出中国一以贯之的造型传统，又能看出因用途观念不同而造成的显著差异。而在把关注视角聚焦于清代佛教名山图上之后，我发现几类地图互相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时空构建方式，其所折射出的丰富的信仰世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清代佛教的发展情况。

而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对北京图的探索研究。在馆藏北京古地图整理项目中，我接触了从明清到

现代的大量北京地图，这些舆图中定格了不同时期的北京城市形态，充盈着人们对北京的地理观念与文化想象，是老北京情怀与记忆的重要载体。而之后与组里的同事一起实地考察，依照《乾隆京城全图》逐点探访北京城的边边角角。我惊讶地发现，不起眼的角落里蕴藏着丰富的掌故，那些熟悉的街道也都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这座我已经生活十多年的城市，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去探寻。调查之余，自己查考史籍，史料线索的加入又再次丰满了地图背后的故事。在古地图、古文献与现状的对勘中，北京旧城在我眼前依次打开，从此，这座我每日生活的古城不再平面，它的面貌骤然鲜活立体起来，让我切实感到历史的层累叠积。

研究舆图，也对我的学术视角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往我研究文学文献较少关注图像，而工作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开曾经研究的《诗经》古籍，其中一页赫然印着《十五国风地理图》，这幅图像为我以前所忽略，而新的视角与经验让我突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研究，我发现“《诗经》地理图”及其所连带的种种《诗经》图像，包含的思想资源极为丰富，有着非常广阔的探索空间。故而我借此契机，结合起曾经所学和工作所得，以“诗经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主题，申报了国家级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在几年来的工作中，我结识了不少学界的专家，并在享誉业内的《文献》《文化杂志》《云

南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古地图相关论文，被《中国文化研究通讯》等转载，受邀担任《地图》杂志“阅读地球”专栏常驻撰稿人，主编《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档·定东陵卷》。舆图研究为我打开了新的大门，由此，图像造型、历史地理都成为了我的兴趣。而对这些内容的学习收集，不仅作为我的工作内容，也成为我的生活方式。家中的书架已经大量放入图像学、历史地理学的相关书籍，在生活中遇到古地图，我也会特别留意。疫情前去伊朗旅游，恰逢伊朗国家图书馆展出伊朗古地图，其中一套古地图绘制方式非常特别，我拍摄了不少资料，计划将其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古地图对观，思考在现代地图学成熟之前，人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是如何将广袤无垠的自然空间加工为人们头脑中的人文图绘的。

古籍馆舆图组是一个古老又年轻的团队。1909年，清学部将内阁大库百余种明清绘本地图拨交京师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地图特藏的肇始。1929年，舆图部正式成立，几经风雨已经走过了近百年，这份传承难能可贵。而今天，舆图组也聚集了一群优秀的、年轻的专业人才，翻阅舆图组的博客“咫尺天下”，大家凭借着对舆图工作的热爱，一直在从事各类实地调研工作，向社会各界介绍舆图方面的知识，和学界的同好、同道互相交流。我很珍视进入舆图组研究学习的经历，它为我打开了新世界，为我的学术与生活增添了新活力。

“理科生”圆梦古籍保护装备研发

□周华华 天津森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华华，天津森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低氧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与团队一起致力于加强低氧气调技术在古籍、档案、文物等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研究与推广，突破国际技术壁垒，打造国产自主品牌的技术与产品。

也许是一种缘分，求学时有幸在图书馆整理文献资料，看着泛黄的书籍，每每翻开，还能闻到时光流逝、环境变迁所赋予古籍特有的味道，这种味道让人感觉亲切，同时也为她的慢慢老去感到担忧。作为一名理工科的学生，从未曾畅想过，有一天会与珍贵古籍、字画面对面交流，瞻仰她的魅力与风采，倾听她的痛楚与辛酸；更未敢奢望所在团队能参与古籍保护技术装备研发工作，让它容颜永驻，健康传承！

踏进天津森罗公司后，了解到企业在未来发展的长远规划，其中就包括加强低氧气调技术在古籍、档案、文物等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研究与推广，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重点突破国际技术壁垒，打造国产自主品牌的技术与产品，服务更多的文博单位。自此，我与古籍保护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国拥有浩如烟海的古籍收藏，大部分藏于图书馆、博物馆、寺庙及收藏家手中等。但饱经战争摧残与自然灾害影响，尤其是随着近现代工业时代的崛起，环境污染加剧，配套环境调控设施不完善，导致温湿度波动大，使

古籍普遍面临着酸化老化、字迹褪色、虫蛀霉变、鼠啮等问题，甚至存在水淹、火灾等风险。

入职后，我通过走访多家古籍保护与修复单位，与业内资深专家学习交流等，深刻地了解到造成古籍损坏的主要原因是储藏空间密封性差，受外界环境温湿度昼夜交替变化，虫卵、霉菌孢子以及污染性气体入侵等所致。传统的修复、化学熏蒸、真空充氮、物理辐射等方法可以解决部分古籍病害“治”的问题，但保护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如何从“治”向“防”转变。

自2011年开始，我所在的团队先后同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单位，围绕“古籍杀虫防虫、防霉抑菌、防老化酸化，及其最佳环境储藏参数等”开展课题研究。结果证明，低氧气调技术可以100%杀灭古籍中的害虫，杀灭90%以上的霉菌，对约10%的霉菌有极其明显的抑制作用；同时，在氮气环境中保存的单宣、桑皮纸、苦竹纸、字典纸和打字纸等防老化效果较空气环境下更好，尤其是耐久性最差的打字纸效果差异最明显。“低氧

气调技术在纸质档案虫、霉防治与储藏保护中的应用研究”课题于2018年荣获“国家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为该技术的应用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做好古籍保护工作，要改善并提升古籍保存环境。首先，要解决围护结构密封性问题，尽力降低换气率，阻隔大气中灰尘、温湿度、有害生物和污染气体等，维持密封空间内环境稳定与洁净。密封性做得好，还可以做到高效防水，应对突如其来的洪灾等，为藏品抢救争取更多时间。有了密封性好的储藏柜、展柜，再配套使用上恒湿净化设备，便可以实现古籍“稳定、恒湿、节能”储藏保护。

在此基础上，我们研制开发了新一代气体洁净、温湿度调控、氧含量调控、智慧馆藏监控管理系统等，通过对多个藏品储藏空间内的温湿度、气体成分、气体质量等进行独立预测、分析与调控，最大限度地避免古籍等累积性损害，达到“杀虫防虫、防霉抑菌、防污染、防化学腐蚀、防火”等综合效果。

森罗股份对上述技术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总结，提出来“高密

闭环境下智能气体调控技术”，简称“CATHSE”技术体系，并注册了CATHSE系列商标，系列产品六次荣获“全国十佳文博技术产品与服务奖”。

“CATHSE”技术产品与服务已应用于首都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中国铁道博物馆、蒲松龄纪念馆、三苏祠博物馆、广州海事博物馆、山东省考古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等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及私人收藏机构，满足藏品长期预防性保护储藏、展览展示需求。以上海图书馆为例，为满足批量古籍、善本、字画等预防性保护储藏、虫霉防治、展览展示等需求，设计研制了580m³高气密展示库房，配套低氧恒湿洁净调控系统及柜架、挂画架等，湿度可在40%RH~65%RH范围内任意调控，调控精度≤±3%RH，氧含量可在2%~5%范围调控。同时，系统配置了常压低氧气调杀虫系统，满足馆藏古籍善本入库、定期消杀。两套系统通过“智慧库房监控管理平台”通过大屏显示器查看各库房参数及配套设备运行状况，通过手机App、PC机等远程智能监控管理。

古籍保护
“她力量”

从抽象的“口号”到深深的敬畏

□王东琪 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

从事古籍保护的年轻人大多有一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我也不例外。最初爱上传统文化是因其风花雪月的美感与情怀理想的崇高，故而在读大学时也选择了相关的专业。真正开展系统学习之后才明白除了文学亦有文献，而文献学可以说是“学中第一紧要事”。没有良好的文献学基础，不论是文艺或是学术都是空中楼阁。基于此认识，读研时为了能学些基础且扎实的功课，使自身

不至溺于虚无，我选择了古典文献学作为自己的志向。读研期间虽学习了版本目录等相关知识，但始终觉得隔了一层。直到一次偶然的机，得知学校古籍馆招募学生整理馆藏古籍，怀着好奇之心，我报名参加，自此第一次真正接触古籍普查这项工作，也由此萌发了从事古籍工作的想法。

毕业后，我有幸进入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来此工作的第一年便参与到“中

华古籍保护志愿服务宣传推广活动”中，从2016年到2019年四年间，与志愿者们一起，用自己的星星之火，助力着安徽省古籍保护工作的不断前进。自2016年正式从事古籍工作以来，已过去六年有余，我接触了普查编目、读者阅览、古籍数字化、书库管理等各种工作，虽工作内容各异，但都是古籍保护、利用与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古籍保护也由抽象的概念变为每一件具体的小事。

在真正深入到这个行业之前，古籍保护对我来说只是一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口号，而现在是一份需要常怀谨慎敬畏之心，脚踏实地、常自躬省的工作。

新的一年，我将继续在自身的岗位上认真完成每一天的工作，少谈理想，多做实事，做好书库管理与读者服务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学习提升，将古籍保护的理论与知识融会到日常工作中来。



王东琪，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参加工作六年有余，参与了普查编目、读者阅览、古籍数字化、书库管理等古籍保护工作，尤其是连续四年参与到“中华古籍保护志愿服务宣传推广活动”中，成功将古籍保护的理论与知识融会到日常工作中。

鲜为人知的《百花新咏》 一部歌咏《红楼梦》女性的诗词著作

□寻 霖 湖南图书馆

《百花新咏》一卷，不著撰者，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吐雾山房藏板。今遍查各公藏图书馆书目，皆无记载，仅于长沙民间见到一本。此书以往一直不为人所知，也无研究或论及此书者。

是书卷首有嘉庆丙子二十一年朱宁远序，云：“粤稽葩经、二南风化之盛，诗教所自始也。一时宫中妃嫔、汉南游女，无不谐声协律，得其性情之正。厥后以诗试士，而闺中吟咏如若兰、道韞者，恒不多觐。我朝人文蔚起，诗学昌明，宫闱内外素娴声韵。偶得友人京归所送轻扇，上印《百花新咏》诗百首，悉为闺阁佳人之作。其随花吐属，各赋其事，各言其情，而端庄静一人品，于此立见。盖二南风化之盛，今尤烈焉。且琢句清丽，风味悠然，比之骚坛名将，可与颉颃。但扇中文字，难免亥豕之讹，因写为读本，付诸剞劂，以供同好，似亦不无补于习诗家者抒发性灵之一助云。嘉庆丙子岁，静斋朱宁远新镌百花新咏。”

朱宁远，籍贯生平不考。自序文内容判断，应为此书刊刻者。序称“偶得友人京归所送轻扇，上印《百花新咏》诗百首”，则其时作者已不可考。当然也不否定朱宁远即为此书作者，只是羞于此类游戏文字而托名他人。

书中选取《红楼梦》中100位女性，自贾元妃始至宋妈止，后殿以贾宝玉，共一百零一人，分别是贾元妃、贾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妈、林黛玉、薛宝琴、迎春、惜春、薛宝钗、探春、李纨、邢岫烟、史湘云、秦可卿、凤姐、宝珠、巧姐、喜鸾、佩鸾、佩凤、尤氏、尤二姐、尤三姐、周姨娘、赵姨娘、香菱、平儿、晴雯、袭人、紫鹃、小红、鸳鸯、麝月、琥珀、雪雁、侍书、司棋、金钏、玉钏、彩明、秋纹、同喜、同贵、宝蟾、瑞珠、傻大姐、彩霞、胡氏、二丫头、四姐儿、金文翔媳妇、入画、翡翠、抱琴、彩云、小蝉儿、莺儿、小鹊儿、翠缕、口口、女伶文官、女伶药官、女伶芳官、女伶藕官、女伶蕊官、女伶葵官、女伶艾官、女伶荳官、女伶龄官、素云、春燕儿、秋桐、娇杏、绣橘、蕙香、翠墨、丰儿、坠儿、赖太母、王宝善家的、柳嫂子、王柱媳妇、周瑞家的、林之孝家的、秦显媳妇、玻璃、多姑娘、柳五儿、夏金桂、李纹、李绮、净虚老尼、妙玉、智善小尼、智能小尼、马道婆、李嬷嬷、刘老老、宋妈、贾宝玉。每人喻以一花，各作七绝一句（其中李纹、李绮两人共一诗），共一百首，故名。

书中所咏女性，既有皇妃贵妇，如贾元妃、贾母、王夫人、邢夫人；又有大家

闺秀，如林黛玉、薛宝钗、邢岫烟等；既有年青丫环，如晴雯、袭人、紫鹃等；又有女伶小尼，如藕官、蕊官、智善等。甚至还有仆妇老嫗似与花无缘如赖太母、王宝善家的、王柱媳妇等。诗“随花吐属，各赋其事，各言其情”，或写人物性格，或写人物命运，或抒发对人物同情怜爱、厌恶憎恨，有褒有贬、有扬有抑。

又查各类文献，得知贵州省毕节市博物馆藏有绢本四条屏，屏上蝇头小楷钞写了与刻本内容大致相同的一百首诗，首行题“红楼梦百合诗”，末行题“光绪庚辰岁七夕前湘西少青老人六十有二黔西官舍学书”。少青老人为黔西知州曹昌祺之母。曹昌祺，长沙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光绪二年（1876）任贵州湄潭知县，四年（1878）官黔西州（今贵州黔西县）知州。期间奉母随任，孝敬有恒。光绪十二年（1886）又任普安直隶厅同知，十六年（1890）调署铜仁府知府，十八年（1892）任大定府（治毕节）知府。此绢本为少青老人于其子曹昌祺黔西知州任内所书，后携至大定府，今藏毕节市博物馆者。而毕节博物馆误以该年（光绪庚辰六年，1880）及湘西少青老人作为该诗的创作年代及创作者。

1990年原毕节地区博物馆曾以《红楼梦百合诗》为名，内部印刷若干册。2018年《贵州文史丛刊》第一期刊登了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王明贵所撰《诗屏花语看红楼——晚清女诗人曹太夫人的〈红楼梦百合诗〉》一文，文中沿袭了毕节博物馆对《百合诗》创作者及创作年代之误，又刊出诗百首全文。这也是目前所知研究《红楼梦百合诗》的唯一论文。

毕节绢本人名在前，花名在后。嘉庆刻本却是花名在前，人名在后。百花顺序也稍有不同，如毕节绢本中薛宝钗在林黛玉后、薛宝琴前；绣橘在蕙香后。

由于鼠啮，毕节绢本有二十三首诗残缺。嘉庆刻本也有一页缺失，少四人，据毕节绢本，四人为“万蝶花口口”“紫薇花女伶文官”“长春花女伶药官”“丁香花女伶芳官”，两本可互相补充。诗文内容也互有异同，如“玉簪花玉钏”，嘉庆刻本诗作：“十二钗中似有无，三分颜色尚莺雏。浑然一片天真在，姑负多情小意谗。”毕节绢本作：“十二钗中似有无，三分颜色映璠瑜。浑然一片天真在，孤负多情记挂奴。”“覆杯花王柱媳妇”，嘉庆刻本诗作：“花似杯倾酒未干，中藏不露量原宽。漫凭密叶能深隐，却被旁人醒眼看。”毕节绢本作：“花似杯酒乍干倾，中藏不露量原宽。漫凭复叶能深隐，却被人醒傍眼看。”“百合花贾宝玉”，嘉庆

刻本诗作：“聪明心性自天成，疑是神仙降玉京。幻海茫茫轻亦转，多情到底却无情。”毕节绢本作“聪明心性自天成，疑是神仙降玉京。幻海茫茫轻一转，多情到底是无情”。其中既有嘉庆刻本误者，如“林之孝家的”，误为“楚孝家的”；“金文翔媳妇”误为“全文媳妇”；“虾须镯”误为“虾须剑”。也有毕节绢本误者，如“王柱媳妇”误为“玉柱媳妇”；“素云”误为“素霞”等。

是书传本甚为罕见，其内容多不为人所知。今选录其中若干人物以飨读者。内容与毕节绢本有异者，以括号加注毕节绢本文字于后。

牡丹花贾元妃
富贵荣华第一春，百花总领丽芳辰。
瑶台下无双品，快沐天家雨露新。

萱花贾母
忘忧萱草茂庭前，天上星精宝婺悬。
戏彩承欢延岁月，北堂福寿庆长年。

荷花王夫人
气度温醇德性嘉，身居罗绮质无瑕。
群芳谱内谁堪拟，不蔓不支君子花。

紫荆花邢夫人
琐细丛开簇几枝，堂前相伴媚春曦。
莫言此树无关系，家运荣枯亦暗随（暗亦随）。

四照花薛姨妈
葳蕤四出灿高枝，密叶茏葱隐（影）陆离。
五色微酣光并（普）照，春风秋月（水）总相宜。

蕊珠花林黛玉
绛珠仙子降瑶池，还泪酬恩事更奇。
莫道情情情不了，人间天上总情痴。

琼花薛宝琴
堆琼琢玉向春（君）开，独占花中第一魁。
借问人间谁得似，瑶池仙子下蓬莱。

迎春花迎春
堪叹迎春枉命名，春风不遇可怜生。
紫菱洲畔重回首，惆怅东君太薄情。

优昙花惜春
花号优昙世外香，缁衣色相改红妆。
怜他绣户朱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傍）。

芍药花薛宝钗
中和正气郁葱茏，霁色温柔玉貌丰。
宜室宜家称妙品，幹旋可作补天功。

玫瑰花探春
有色有香兼有刺，无沾无染并无情。
百花队里争强弱，独立岢岢挺正名（承顾勋）。

菊花李纨
不饰（非是）浓妆饰（是）素妆，清心如水映冰霜。
抚孤成立膺封诰，的是黄花晚节香。

山丹花邢岫烟
花似鹿葱还耐久，叶如芍药不多深。
瓦盆移得贫家种，也有清芳伴玉（宝）簪。

海棠花史湘云
一枕花茵入睡乡，等闲惹得蝶蜂忙。
风流娇态谁能画，香梦沉酣醉海棠。

丽春花秦可卿
嫩寒销（锁）梦因春冷，逗得幽香引醉魂。
一片彩云容易散，风前谁设护花幡。

笑靥花凤姐
春风满面弄眉颦，笑里锋芒可畏人。
巾幗丛中称辣手，居然魏武是前身。

虞美人尤二姐
俏立风前饮（抱）恨多，巧逢霁日借（旧）颜和。
赚人一瞬阳台梦，姑（辜）负春光奈命何。

桃花尤三姐
脉脉香魂入梦中，从前艳冶谢东风。
情根割断鸳鸯剑，人面桃花相映红。

菱花香菱
秋水飘菱殊可怜，那堪重忆旧时莲。
情魔未了诗魔重，憔悴西风弱蔓牵。

月季花平儿
芳姿旖旎最宜人，得免莺啼与燕嗔。
信是此花能耐久，红花（腮）长占四时春。

芙蓉花晴雯
芙蓉映（秋）水擅秋妍，弱质难堪霜雪天。
黄土垄中受薄命，红绡帐里玉（独）无缘。

兰花袭人
花气袭人殊众草，多情岂为小星惭。
可怜数载殷勤意，一段幽香付玉函。

杜鹃花紫鹃
鹦哥解咏葬花诗，脉脉幽怀暗思。
翠袖无端红泪湿，子规啼处惹情痴。

樱桃花小红
轻盈丰度态婆婆，点点嫣红助艳多。
巧语关关樊素口，樱桃花比不差讹。

旌节花鸳鸯
娉婷不嫁自全真，缥缈仙姿迥绝尘。
侍得瑶池王母驾，羞他清静女儿身。

酴醾花麝月
一枝缟色分明好，三月韶芳烂熳开。
夜静露华新浴后，却疑人佩麝囊来。

夜来香（花）多姑娘
数漏忽来枕畔香，好风吹上独眠床。
虽然不比巫山雨（女），也算风流夜度娘。

合欢花刘老老
村老积年多阅历，侯门献笑结欢心。
漫言赚得金银去，患难扶持报亦深。

百合花贾宝玉
聪明心性自天成，疑是神仙降玉京。
幻海茫茫轻亦（一）转，多情到底却（是）无情。

“莎草纸”为什么不是纸

□易晓辉 国家图书馆

“莎草纸”，又称莎草片、纸草片、芭芭纸，是出产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一种纸前书写材料。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造纸术传至西方之前，“莎草纸”在埃及、阿拉伯及古希腊等地得到广泛应用，留下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莎草纸”这一俗名，常常被人误以为是一种“古老的纸”“最早的纸”，甚至是世界“古代三大造纸术”之一。

但是严格来说，“莎草纸”并不能称之为纸。这其实是个挺老的问题，上世纪许多前辈学者曾对此展开过讨论，并基本达成共识：造纸术源自中国，并传遍世界。“莎草纸”“树皮纸”“羊皮纸”这些纸前书写材料，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纸。

“莎草纸”不是纸的三个原因

第一，不符合纸的定义。

“莎草纸”是不是纸，要看纸的定义怎么讲。我们平常对纸的理解，主要有两个视角：

从使用功能的角度，凡是能书写的薄片材料，人们常习惯以“纸”相称。除了现代所用的纸，还有莎草纸、羊皮纸、树皮纸、贝叶，甚至缣帛、简牍也被认为是纸的原型……因此从功能上来看，纸的概念似乎没有边际，太宽泛了。简单理解没啥问题，但学术讨论则需要有明确的边界，能写字的东西多了去了，不能什么都是纸。要将纸和其他书写材料相区分，就涉及纸的材料和工艺概念。

从材料和工艺角度，纸的概念就比较具体。这部分内容其实前人早就研究过，我们直接拿来即可。

1963年版《美国百科全书》：

从水的悬浮液中捞在帘上形成由植物纤维交结成毡的薄片。

美国纸史专家亨特（Dard Hunter）的定义：

在平的多孔模具上由成浆的植物纤维形成的黏结起来的薄片状物质。

“亨老爷子”怕自己没讲清楚，又解释说：

作为真正的纸，此薄片必须由打成浆的植物纤维制成，使每个细丝成为单独的纤维个体，再将纤维与水混合，利用筛状的帘将纤维从水中提起，形成薄层，水从帘的小孔流出，在帘的表面留着交织成片的纤维。此相互交织的纤维的薄层就是纸。

还有我国著名纸史专家潘吉星先生的定义：

传统上所谓的纸，指植物纤维原料经机械、化学作用制成纯度较大的分散纤维，与水配成浆液，使浆液流经多孔模具帘滤去水，纤维在帘的表面形成湿的薄层，干燥后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由纤维素靠氢键缔合而交结成的片状物，用作书写、印刷和包装等用途的材料。

前人对纸定义的描述，基本说清了纸的准确概念。当然这些定义有些长，我们不妨稍微划下重点：

重点一是植物纤维。麻皮竹草这些植物原料没问题，但羊皮、蚕丝等动物原料就不能算，从化学成分上看，植物纤维的主体是纤维素，有丰富的羟基，能形成氢键，这是造纸的化学基础。羟基和氢键可以简单理解为植物纤维自带



粘钩，不用胶就能粘在一起。其他纤维不具备这一特性，无法成为典型的纸。

重点二是把纤维完全打散。通过物理、化学或者生物的方法去除原料中的杂质，将纤维提取出来，成为分散的单根纤维。这一步非常关键，莎草纸、树皮纸虽然是植物纤维，但没有将纤维完全打散，因此也不能称为纸。

重点三是纤维重新聚合。借助水的作用让纤维分散均匀，然后再将水滤去，使纤维交结形成薄片，干燥后纤维间依靠“粘钩”粘在一起，形成氢键结合，具备一定强度。这跟重点一相互呼应。所以有些无纺布之类，依靠胶把纤维粘在一起，不是自粘，就不能算纸。

重点四是满足书写印刷等使用要求。从这四个重点来看，成为一张纸，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先得把植物纤维完全分散开，然后再让它们重新聚成薄片，彼此间还必须依靠自带的粘钩连在一起。缺少任何一个要素，便不是真正的纸。

这是从概念层面解释“莎草纸”为什么不是纸。仅仅把莎草茎秆剖成薄片，横竖摆在一起，拿石头砸成一张薄片，没有把纤维完全打散后再重新聚合，纤维之间的粘连主要依靠茎秆中的淀粉及胶质物，工艺层面上与纸张的基本要素都不符合。

所以，未经千锤百炼、水深火热、粉身碎骨后再滤水重生，是无法成为一张纸的。

第二，与纸无渊源。

“莎草纸”不是纸，还在于二者没有任何渊源，不存在传承关系。

虽然在工艺和概念上不能算纸，但也有些学者将“莎草纸”看作纸的“前身”“原型”，给人的感觉好像纸是由“莎草纸”“树皮纸”这些比较原始的“纸”演化而来。

这类观点大多是从功能角度出发，并没有严格考证纸的工艺概念，“莎草纸”跟中国纸原本就是毫不相干的两种东西，相隔十万八千里，八竿子打不着，没有任何关联。

虽然习惯上叫它“莎草纸”，虽然英文中“paper”由“papyrus”而来，但名称上的相互借用只不过是人们认知过程中的概念投射，改变不了二者在渊源上毫不相干的事实。一个由古埃及人发明，一个是由汉代中国人发明，井水无关河水，不应混为一谈。

既然不符合纸的定义，跟纸也无渊源，为什么还叫“莎草纸”呢？其实“莎草纸”只是人们的习惯性叫法，有前辈专家认为应该叫“莎草片”，个人觉得是比较贴切的。

“莎草纸”不是纸，就像海马不是马，天牛不是牛，壁虎不是虎，鱼香肉

丝没有鱼，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一样。

第三，被纸彻底取代。

两种原本毫不相干的书写材料，随着商品的流通和技术的传播，最终在阿拉伯世界相遇。当造纸术在8世纪经由波斯传至巴格达，阿拔斯王朝迅速抛弃了昂贵的莎草片，将纸张指定为书写公文的材料。

公元900年前后造纸术传至埃及，开罗建立了非洲第一家造纸厂。很快莎草片就被纸张替代，然后迅速消亡。这种替代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出土的两封9世纪末的阿拉伯文书信中，竟不约而同附有这样一句话：“此信用莎草片书写，请原谅。”因为没能用纸张书写而表示歉意，可见书写载体正常已由纸张代替。

10世纪以后，莎草片的制作技术彻底失传，古人如何制作莎草片，从此成为一个谜。今天埃及制作莎草片的方法，是由一位埃及工程师在1962年复原。至于这方法与古人是否一致，似乎难以考证了，成品看上去相差不大，权当它们是差不多的吧。

莎草片的劣势

尽管从外观上看，莎草片与纸张有一些相似，都是以植物原料制成的薄片状书写材料。但由于制作工艺不同，二者的特性有很大差别。跟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相比，莎草片的劣势非常明显。

脆硬。由于制造过程未去除植物组织中的果胶、淀粉、木质素这些带有粘结性的杂质，莎草片质感非常脆硬，没办法像纸一样自由折叠，只能卷起来存放，并不十分方便。而且大量的果胶质、木质素还会加速莎草片老化，尤其在潮湿环境中保存，老化脆化速度非常快，

老化的莎草纸很容易被压碎或抻碎。那些存世的古代莎草片，一般保存环境都非常干燥，才得以留存。

内卷。莎草片的另一个毛病是内卷，它的内卷是自然内卷，卷起来就摊不直的那种。这种特性与莎草片的结构有关。制作莎草片时，先把莎草茎秆剖成长条状的薄片，将薄片在板上横着铺一层，再在上面竖着铺一层，然后用木槌慢慢砸，把两层薄片砸到一起，一张莎草片就做成了。植物纤维原料有个特性，在干湿变化时，纵向尺寸一般较稳定，横向伸缩相对明显。因此莎草纸在干燥之后，与薄片平行的方向上会产生收缩应力，形成顽固性的内卷趋势。一旦卷起来，就很难再恢复平整，甚至越卷越紧。用莎草片书写的长卷，阅读时常要用两手一直抻着，一旦松手，就迅速卷起，老化后的莎草片还要当心展开时被掰碎，非常不方便。

昂贵。莎草片制作过程比较简单，按理说应该很便宜。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莎草产地单一，只生长于尼罗河三角洲。其他地方如阿拉伯、希腊等地想买，山高路远独一份，肯定便宜不了。莎草片贸易为埃及换回大量黄金，托勒密五世还曾断供帕加马莎草片，以施制裁。断供的结果是促使帕加马的羊皮纸兴起，后来羊皮纸还传至埃及，抢占莎草片的市场……对于书写材料而言，昂贵是非常致命的，大家都用不起，自然会被更经济的材料取代，莎草片、羊皮卷，莫不如此。

中国的“莎草纸”

尽管莎草片被纸张替代，但其在此之前的历史却也足够辉煌。它比中国的造纸术早了差不多有3000年，在如此远古的时代就发明了这么轻便的书写材料，也是相当厉害的。在几千年时间里，莎草纸有没有可能传到中国呢？从现有资料来看，似乎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的确，从埃及到中国的距离，实在是太难为古人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倒是有与莎草片类似的书写材料——蒲草片。

1991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泾阳高家堡一处距今3100年前的商周戈国墓葬中，发现一叠青铜器的衬垫物，经分析为纵横交错排列的蒲草片，与莎草片的结构非常相似。

唐代徐铉的《初学记》中还曾记载过这个蒲草片：

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裁之，名曰幡纸，故其字从系，贫者无之，或用蒲写者，则路温舒截蒲是也。

提到西汉的路温舒没钱，用蒲草写字，在《汉书·路温舒传》中也提过这件事儿：

温舒取泽中蒲，裁以为牒，编用写书。

看来汉代除了用简牍缣帛，蒲草片也是一种经济的选择。结合戈国墓的考古年代，这种蒲草片的历史甚至能上溯到商周时期，尽管只是作为青铜器的衬垫物，未发现有用蒲草写字，但还是让人对这种材料的历史产生遐想。埃及人用莎草制作莎草片，中国也有蒲草制作的蒲草片，大家英雄所“造”略同？

遗憾的是，戈国墓出土的蒲草片似乎并未引起多大关注，也未见有后续的深入研究，甚至连资料都非常少。